

文學遺產

選集

三輯

文學遺產選集三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中華書局

文學遺產選集三輯

《文學遺產》編輯部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欄市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7號

西四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毫米 1/32·135/8印張·309,000字

1960年5月第1版

196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 001—6,200 定價:(7) 1.40元

統一書號:10018·228 59.12.京型

出版說明

爲了滿足古典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要求，我們又編輯了這一本《文學遺產選集三輯》。這本集子的編輯，距《選集二輯》的出版時間，已經有兩年零九個月了。《選集二輯》的選目截止於本刊第120期，本選集的選目則基本上是從本刊第121—270期中選出來的。共有文章42篇，約三十一萬多字。選擇文章的標準較之過去所出的兩本選集都稍嚴一些，因爲過去的選集是每60期選一輯，而本選集却是150期選一輯。

在本選集編輯以前，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編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十二冊，其中收有本刊所發表的文章約120篇。爲了避免重複，凡已經收輯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中的文章，我們都儘量不選。但因考慮到使這本選集能夠多少反映本刊各個階段的工作面貌，才重複選了二篇文章，即譚家健的《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徵》和劉世德的《“封神演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描寫》。此外，本刊所發表的關於李商隱、陶淵明、李清照和《胡笳十八拍》的討論文章，因爲我們準備另出專輯，所以都沒有選進這本集子裏。

本集所選的文章，除了原作者在個別字句上略有更改外，一般都保存了原來發表時的本來面目。特此附帶說明。

《文學遺產》編輯部

1969年7月

F260/03

目 次

如何對待古典文學，怎樣古爲今用.....	邵荃麟(1)
怎樣評價古典文學.....	以 羣(10)
略談“五四”以來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范 寧(14)
文學史討論中的幾個問題.....	何其芳(24)
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史研究上的一些問題.....	林 庚(59)
對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幾點意見.....	游國恩(68)
* * *	
從《魯迅批判》到《文學史家的魯迅》.....	譚玉模(81)
* * *	
對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的一些意見.....	卞孝萱(92)
《楚辭論文集》——資產階級考據學.....	李鎮淮(100)
* * *	
關於蒙古的傑出的作家——尹湛納喜	
及其作品.....	額爾敦陶克陶(110)
談西藏薩班·貢噶江村及其哲理詩.....	王 堯(118)
* * *	
曹丕的文學理論.....	炳 宸(128)
關於《文心雕龍》的評價問題及其它.....	郭紹虞(135)
關於劉勰的文學批評理論與實踐.....	毛任秋(143)
(附錄)答毛任秋《關於劉勰的文學批評	
理論與實踐》.....	郭紹虞(157)

劉勰文學理論的中心問題……………舒 直(159)

讀《詩品》……………羅根澤(166)

也談王國維的“境界”說……………葉秀山(173)

* * *

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徵……………譚家健(178)

柳宗元及其散文……………劉大杰(200)

吳敬梓《文木山房集》外遺文的發現……………陳汝衡(210)

* * *

關於“樂府”……………蕭滌非(214)

在文學史上應該怎樣評價曹操……………祝 本(227)

鮑照詩的藝術特點……………陳 寂(233)

陸游的思想基礎……………朱東潤(238)

* * *

五代兩宋詞的評價問題……………王季思(249)

論柳永的詞……………唐圭璋、金啓華(256)

關於柳永及《樂章集》……………何芳洲(266)

東坡詞的意境……………程毅中(272)

辛稼軒的農村詞……………夏承燾(281)

讀吳夢窗詞……………陳廉貞(289)

* * *

繼承諷刺藝術的戰鬥傳統——古代

滑稽戲簡論……………祝肇年(298)

《牡丹亭》的浪漫主義色彩和現實主義

精神……………陳志憲(308)

* * *

試論唐傳奇與古文運動的關係……………王運熙(321)

我對變文的幾點初步認識……………徐嘉齡(333)

《封神演義》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描寫……………劉世德(341)

談在《三言》《二拍》中所反映的市民

生活的兩個特色……………鄧允建(353)

略談《聊齋志異》的幾種本子……………葉 餘(366)

*

*

*

魯迅——祖國文學遺產的繼承者和

捍衛者……………劉俊松(374)

魯迅《古小說鈎沈》的輯錄年代及所收

各書作者……………林 辰(385)

*

*

*

談清代考據學的一些特點……………王 瑤(408)

校勘學對於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作用……………何文廣(416)

如何對待古典文學，怎樣古爲今用

邵 荃 麟

厚今薄古與厚古薄今既然是唯物論與唯心論的鬥爭，所以它是個世界觀問題。如何對待古典文學，首先也是這個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只在教什麼、如何教等問題上去研究，也還是不能根本解決。中文系古典文學的比重要減少，教材要精簡，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用什麼觀點去教去學。譬如《楚辭》、《紅樓夢》應該算有積極意義的作品，可是教得不對頭，學得不對頭，也何嘗不會引起消極悲觀的作用。有些人讀了《紅樓夢》，就想學林黛玉去葬花，這不是《紅樓夢》不好，而是讀的人世界觀有問題。有人問李清照的《聲聲慢》這樣的作品以後能不能教？我看問題不在這個地方，而在於用什麼觀點去講，用唯心論的觀點去教，還是用唯物論的觀點去教？有批判的教還是無批判的教？有批判的教也可以警惕我們，不要有那種“尋尋覓覓，冷冷清清”的感情。當然，教材應該選人民性較強的作品，但用禁止的辦法是不成的。我們應該培養同學有鑑別批判的能力，這就首先要求教師自己有鑑別批判的能力。世界觀問題不能解決，那麼一系列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有人講，理智上承認了應該厚今薄古，可是感情上總覺得古典作品容易感動人，容易引起共鳴。李煜、李清照的詞，也知道它不健康，可是讀起來就覺得比現代作品有味道。這是什麼問題？我看就是世界觀的問題。所謂學術上的共鳴，是指作品中所表現的某種思想感情和讀者的某種思想感情相結合。社會的生活是發展過來的，現代的人不但可能理解古代人的生活，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思

想感情可以相通；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思想感情總是受他的時代和環境生活所支配，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人；在思想感情上就有距離。不承認前一點，就無法說明古典作品為什麼能引起我們共鳴；不承認後一點，那就會變成超階級論者。正因為這樣，所以某些古典作品，對於某些人容易引起共鳴，而對另外一些人則引不起共鳴。舊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對李煜、李清照感到親切，主要是因為他們多半出身於沒落階級，因此他們的思想感情上，多少和那些詞人具有共同的基礎。尤其是在轟轟烈烈的日子裏，有些人仍然戀戀不捨於“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感情，說得率直一點，多少是反映着一種沒落階級的共同感情。如果把這些詞，解釋給勞動人民聽，或給經過革命鍛煉的干部讀，那就很難引起這種共鳴了。一個人的思想感情，是隨着生活而變化，原先喜愛這類詩詞的人，在思想感情改變以後，他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態度，也就會變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們決不能得出這樣一個邏輯：某些作品能够引起我們的共鳴，所以就是好的作品。這是唯心主義的觀點。事實上，即使某些偉大古典作品，對於各個時代各個階級的人，都可能引起共鳴，但是引起他們共鳴的思想感情，却也並不相同。例如，有人是愛好林黛玉那種纏綿悱惻的戀愛感情，有人則是愛好她那種敢於反抗的精神；有人喜愛杜甫的《三吏》《三別》，有人則喜歡他晚年抒發哀愁的作品。這說明一個事實：不但文學作品有它的階級性，就是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欣賞和理解，也必然是有一定的階級觀點。正因為這樣，才有各個不同階級不同的對文學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對於現代作品，也是一樣，有人說現代作品不能引起共鳴，這並不能證明現代作品不好，如果你對現代人民鬥爭生活不熟悉，或者缺乏現代人民那種革命的思想感情，即使這些作品再好，你也是無法引起共鳴。

的。唯心主義者對待文學作品，總是片面地強調主觀的感受，因而就否認藝術的政治標準。唯物主義者則首先從正確的立場觀點上去認識作品中所反映的客觀真實性和其社會價值，因此要求政治與藝術的統一，而以政治標準為第一。這是唯心主義者與唯物主義者在對待古典作品上一個基本區別。

講到真實性，又有人說，像李煜、李清照的詞，固然不很健康，但究竟是表現了真情實感，是具有藝術的真實性的，不能貶低它們的藝術的價值。這裏牽涉到什麼是藝術的真實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曾經被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弄得混淆不堪。所謂真實性，究竟是指作者自身寫作時的真情實感呢？還是指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歷史的真實呢？毫無疑問，一部好的作品，作者的感情總是真摯的。但是所謂真摯的感情，總有它的社會基礎。李煜、李清照的詞中所表現的感情，就其本人來說，當然是真摯的，而且他們還是以高度的藝術技巧表現了他們的真摯感情。但是這種情感的基礎是什麼呢？這種情感健康不健康呢？而更主要的是從這些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真實性又有多少呢？馬克思主義者所謂藝術的真實性，首先是指藝術作品中所反映出來的歷史真實性，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評論，主要的着眼點都在這裏。偉大的古典作品的價值，首先表現在這裏。譬如《楚辭》，不僅表現了屈原那種浪漫主義的追求精神，並且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歷史鬥爭。杜甫的詩充分反映了安史之亂以後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生活。《紅樓夢》、《水滸傳》都寫出了一個時代的歷史面貌。這些作品不但從社會本質上反映出歷史的真實，而且表現了作者對於社會生活的鮮明的態度或強烈的政治感情。正因為這樣，所以這些作品不但給予我們以強烈的感染力量，並且具有積極的教育意義，也正是從這些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政治性與藝術性對立的統一。屈原、杜甫

等人，就是因為有進步的強烈的政治感情，所以才能夠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社會的矛盾和鬥爭，而由於他們真實地反映這些矛盾和鬥爭，才使他們的作品具有更偉大的藝術力量。而在李煜或李清照的作品中，除了反映他們個人的傷感情緒以外，我們又能找到多少這樣的真實性呢？

我們常常喜歡用“人民性”“現實性”這樣的概念去分析古典作品。但所謂“人民性”“現實性”並不是標籤，而應該是從作品所反映的歷史內容中去說明。否則一切作品都給貼上這兩條標籤，這就變成教條主義了。我們又常常喜歡用“歷史局限性”一語，把古典作品的一切缺點都掩蓋了，這也是教條主義的辦法。古代作家的時代局限當然是有的，但只能說明他們對於現實認識上受到時代的限制，而不能作為他們傾向性的辯解。區別古典作品中的民主精華和封建糟粕，我認為主要就是在傾向性的問題上去區別，也就是毛主席所說“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

對待古典作品的正確態度，我想應該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去分析它們，和以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去評價它們。我們既不要故意去美化古人，也不要故意醜化他們；既不用古人的觀點去評價古人，也不要將現代人的帽子戴到古人的頭上去；既反對超階級的唯心主義觀點，也反對貼標籤式的教條主義方法。應該實事求是，給它們以一定的科學地位和科學的評價，從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的精華。這才是對於古典文學真正的尊重，既不是頌古非今，也不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盲目崇拜。

同學們批判了那種今不如古的說法。這種說法就是反映了那種頌古非今的思想。這是牽涉了對於文學評價的問題。對於文學

的評價，也應該首先從爲什麼人的問題出發。現代社會主義文學雖然還是在新興的時期，但是它是以戰鬥的姿態，直接爲勞動人民服務的。作爲文學作品的主人公主要就是勞動人民，這是過去的文學所沒有的。就這一點，我們就應該給予它以崇高的評價。文學是反映生活的，生活發展得這麼快，而反映生活的文學却今不如古，這是很難想像的。這裏我看是有一種迷信的觀念在作怪。任何新的事物出現，總會受到一些人的反對。《紅樓夢》、《水滸傳》現在是公認是好書了，但以前是被認爲是“誨淫”“誨盜”的禁書，不准公開看的。普希金現在是沒有人反對了，但普希金在當時就遭受過許多人的反對。果戈里一出現，在小說裏描寫窮苦的小人物，當時許多人就詛罵他，可是別林斯基却大力肯定他，就是因爲他敢於以這些窮苦貧民爲作品的主人公，並且指出果戈里這種創造是給文學帶來新的特質。我國左聯時代的革命文學，也是遭受資產階級的反對的，但是魯迅就肯定這是中國唯一的文藝。可見厚古薄今的傾向中外古今都有，都是經過鬥爭的。現在出現在我們作品中，已經不是果戈里時代的人物，也不是左聯時代的人物，而是嶄新的社會主義時代的工農兵了。這應該說是文學上更大的一個發展，爲什麼倒反而都薄它們呢？1942年以後，趙樹理同志的《李有才板話》、《小二黑結婚》和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作品一出來，胡風之流就死不承認，說不能算藝術。可見這是兩種立場、兩種世界觀的問題。毛主席一再指示我們，新生的東西總是要經過鬥爭才被承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支持新生的力量。對於現代社會主義文學，我們就要採取這種鮮明的肯定的態度，反對那種頌古非今、厚古薄今的態度。

有人說，現代作品內容雖然好，可是藝術水平就不如古典作品。我看也不盡然。首先，藝術形式和內容是不能截然對立起來

的。我國革命文學還不到四十年歷史，而我國封建時代的文學却有兩三千年歷史。這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文學。這樣來作比較，本身就不科學。而且即使從藝術的水平來說，現代革命文學在短短幾十年中的成就和發展，和兩三千年的封建時代文學的成就和發展相比，難道還不如嗎？各個歷史時代，總有一些傑出的偉大作家。像屈原、李白、杜甫、施耐庵、曹雪芹等，這些都是有典範性的人物，而在我們這短短四十年間，出現了魯迅、郭沫若等偉大作家，尤其是毛主席在詩歌上的貢獻，難道不能說是突破了文學上歷史水平嗎？而且我們相信，在這個新時代中，一定還將出現在藝術水平上超過於魯迅，超過於李、杜的作家和詩人。毛主席《沁園春》中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氣概，有這樣的看法。何況對文學的歷史的評價，不應僅僅從少數傑出的作家來看，而要從整個文學的發展來看；那更沒有理由說“今不如古”。以小說來說，宋、元、明、清四代最傑出的長篇小說，就不過《紅樓》、《水滸》、《三國》、《儒林外史》幾部，至於在短篇小說方面，我們現代的作品，更無疑問是遠遠超過宋人平話和明人的《三言》《二拍》的水平了；在戲劇方面，難道我們現代的戲劇還沒有超過元曲嗎？現在有些人，對《詩經》崇拜得很，而對目前的民歌就是瞧不起，難道說現在的民歌反而不如奴隸社會時代的民歌嗎？現在教古典文學都講人民性、現實性，那麼現代作品中的人民性、現實性難道反而不如古典作品嗎？這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的。這仍然是那種神秘的迷信觀念在作怪。我想，如果現代作品中某些藝術的描寫，是出現在古代作品中，印在宋版明版的書本上，許多人就會磕頭禮拜。只是因為是現代活人的東西，所以就瞧不起。人一死，評價就不同，這是很奇怪的邏輯。對魯迅，現在大家都欽佩他，可是魯迅活着的時候，許多資產階級的教授就不肯承認他。對於現代作品也是一樣，右

派分子劉紹棠說 1942 年以後作品不如 1942 年以前作品好。右派分子這種說法是別有用心的，但是也有些人，抱同樣的看法。他們說民主革命時期的作品，比較親切，好分析，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作品，一覽無餘，不親切，也沒有什麼可以分析。這更是沒有根據。實際的情況是這些人自己不熟悉社會主義時代的人民和生活，缺乏社會主義的思想和感情，所以就感到不親切，也不能分析了。把他們這種看法和廣大人民去比較一下，就立刻比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根本的問題是在自己的頭腦，自己的世界觀。對一切事物只從自己的頭腦出發，從自己的感受出發，這就是主觀唯心論。從客觀存在，從現實生活出發，就是唯物論。魯迅小說《風波》中，有個九斤老太，就講“一代不如一代”，這些講“今不如古”的人，我看很有些像九斤老太。九斤老太是個促退派，我們不要做這樣的促退派，要做促進派。

學文學，總是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毛主席說過“對於人民羣衆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後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新民主主義論》）。現在辯論厚今薄古問題，又是向前看還是向後看的問題。如果是向前看，那麼倒應該說，我們現在的文學狀況，遠遠不能適應當前社會主義建設飛躍的前進，因此要加倍努力來提高現在文藝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

厚古薄今、頌古非今應該說是一種奴隸思想。奴隸當慣了，看不起自己，不相信自己，在封建、資產階級的文化面前，萎靡不振。不去掉這種思想，文化的創造性和革新精神是發揚不出來的。

同學們提出：如何古爲今用？這是一個實踐的問題。有人說，古典文學中沒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怎樣能爲當前社會主義服務呢？這樣說法是不理解文化的歷史發展作用。毛主席說：“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

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古典文學中，反映了我們祖先的勞動鬥爭生活，反映了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這些遺產對於今天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築是很有用的材料。一個文學家不僅要瞭解當前人民的生活（這是主要的），也要瞭解中國人民生活是怎樣發展過來的，瞭解我們的民族歷史、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然後才能夠創造出具有深厚的現實主義內容和民族風格的好作品。魯迅就是一個例子。魯迅是非常瞭解自己民族的一個作家，所以他的作品不但深刻地寫出了中國人民的靈魂和性格，並且創造出最富於民族色彩的卓越風格。要能夠做到這樣，就得用正確的科學觀點，清理古代文學的發展，善於區別其糟粕和精華，吸取其有益養料，經過消化，作為發展新文學創造新文學的條件之一。

毛主席過去對戲曲工作的指示中，說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推陳出新，就是要在批判地接受傳統的過程中創造出具有社會主義新內容、民族形式的文藝。譬如最近黨指出中國新詩歌應該在民歌和古典詩詞的基礎上去發展，應該採取民族形式，在方法上應該是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的結合，這就是科學地總結了幾千年來詩歌創作的歷史經驗，而加以發展和革新。這是古為今用的一個很好的例子。這並不是叫我們學古人去做舊體詩，而是說要在歷來民間文學和古典文學的基礎上去創造出現代的社會主義文藝。這不但對詩歌如此，對其他文學形式也應該如此。好的文學史應該是過去的創作經驗和文藝思想鬥爭的總結。任何新的理論，總是根據於過去的經驗，結合於當前的實際，在科學的唯物主義觀點指導下創造出來的。我們學文學史，學古典文學，都應該掌握這個精神，這個方法，其目的就是為了“出新”。既然是為了“出新”，那就沒有理由去厚古薄今或頌古非今了。

古典作品中，許多是反映了我國人民的勤勞刻苦、英勇鬥爭的性格和生活的。對這些作品，加以正確的處理，正確的闡釋，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勞動鬥爭的積極作用。在目前大躍進中，許多民歌就常常引用古典作品中的形象來作比喻，譬如“青年伙子賽武松，老漢超過老黃忠”，勞動人民對於古典作品這些形象，不但熟悉，並且喜愛。只要正確的處理，並不能說，這些古典作品沒有社會主義，就不能鼓舞教育現代人民。

如何正確地對待古典作品，如何古爲今用，基本問題是觀點和方法的問題，也就是前面所說的，是世界觀的問題。

編者註：本文係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邵荃麟同志在四川大學所作報告中的一段，我們覺得其中對如何對待古典文學及怎樣古爲今用問題都提出了可貴的意見，而且這些也是讀者所關心的，因此徵得荃麟同志同意後，會選登在1958年9月7日本刊第225期上，全文登載在1958年8月份的《草地》上，讀者需要時，可以去閱讀原文。現選入本集供讀者參考。

怎樣評價古典文學

以 奉

我想就我個人所見，來談談對古典文學的評價問題。這也就是用什麼態度來研究和用什麼標準來衡量古典文學作品的問題。

我認爲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應該如毛主席所說，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要求政治性和藝術性的辯證統一。這問題一般在口頭上是接受的，但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却往往會產生問題。例如有的編輯選稿，往往首先從文詞藻飾上着眼，而不是首先從思想內容上着眼，因而看不起工農羣衆反映新鮮事物的創作，這在實際上就是內容和形式的分裂和倒置的看法，也就是藝術標準第一，政治標準第二。對古典文學的評價問題，也同樣必須掌握正確的評價標準，否則繼承什麼，學習什麼，就不可能明確，甚至會流於追求煩瑣考證或文字鋪排的遊戲。上海有個別教授，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只講十幾分鐘，而談到《詩經》裏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句，却可以講上一、二個鐘頭。其實這兩句話除了描寫男女愛情之外，並沒有多少奧妙的道理，這些古典文學的研究家，居然有這樣的本事，這一點也許要特別感謝歷代那些做註釋工作的先生們。今天，要使古典作品得到正確的評價，我以爲首先要研究產生那些作品的時代環境，看它們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呢，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以此來評價作品的進步性——傾向性。因此，文學史家不能僅僅研究文學史，也需要研究社會史。只有這樣，才能解決作爲上層建築的文學和社會基礎的關係問題。

其次，必須有階級觀點。所謂階級觀點，並不是以今天的政治